

阿拉伯民主化的背后：以叙利亚为例

文 / 黄 达 张昕扬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威权政府的形成

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启动的，是民族主义威权政府寻求发展出路做出的一种变革。因此，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其本质与西方理论中的民主化是不完全相同的。

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阿拉伯国家在成立之后，相继成立了威权主义政府。这一现象与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的伊斯兰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另外，还与阿拉伯世界公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阿拉伯国家独特的民主观有着紧密的关系。

具体来说，其一，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性的宗教，使得穆斯林将对真主的无条件信仰内化为对真主代理人即世俗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

其二，尽管阿拉伯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但是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国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高比例的文盲率极大地降低了阿拉伯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使得国家事务呈现了政府精英主导的趋势，这也就造成了权力的集中。

其三，当今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基本上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与民主体制为蓝本，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伊斯兰民主，即基于“舒拉”原则的民主，也即《古兰经》规定的解决重大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的做法。其与西方民众

参与政治不同的是，西方民主思想所体现的是最终主权，而舒拉体现的是真主主权。因此，伊斯兰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众主权民主。

在民主化浪潮席卷阿拉伯国家之前，当政者为了维护其合法性，对于其以外的派别的政治参与一直保持压制的态度。而当阿拉伯国家实施了包括实行有限的多党制、议会制，有限的开放言论以及建立政治协商机制等有限的自由化改革后，伊斯兰反对派纷纷以合法政党的方式崛起，体现了伊斯兰宗教教派之间政治权力的争夺。

教派冲突是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的根本动因

2011年4月22日，叙利亚多个省市爆发了名为“伟大星期五”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叙利亚动荡由此开始。时至今日，叙利亚动荡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反对派与政府达成妥协仍遥遥无期。

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叙利亚动荡开始后不久，就对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干预，或是宣布对其进行制裁，或是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等等。但到目前仍未出现令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叙利亚一直维持了以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教派为主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对以逊尼派为多数的国内民众的统治。而此次由“全国委员会”以及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协调委员会、库尔德人团体和亚述人团体等组成的政府反对派则主要以逊尼派和

库尔德民族为主。所以，此次叙利亚动荡的主体表面上是政府与反对派，实质上则是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什叶派与逊尼派。而两派的冲突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和历史根源。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对外输出什叶派革命，伊拉克南部什叶派首先响应，但遭到萨达姆政权的镇压。随后两伊战争爆发。海湾阿拉伯国家成立海合会，意图集体抵制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输出，从而触发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

进入90年代以后，伊朗获得了难得的机遇期。萨达姆攻打科威特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内讧，而伊朗在核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使得以波斯人为主的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不断增强，这也就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恐惧。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紧张进一步加剧。

而在叙利亚国内，什叶派掌权后，为了维持其合法性，实行了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因此，近来席卷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浪潮被逊尼派认为是难得的重新洗牌和算清历史恩怨的机会。

西方大国受自身利益驱动使其干预行动收效甚微

西方大国之所以支持叙利亚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出于其自身的石油利益和战略利益。

叙利亚地处阿拉伯地区北端的产油区，位于伊拉克大油田的边缘，有800多个油气田。目前已探明储量为25亿桶，占阿拉伯国家石油总储量（7188亿桶）的3.47%和世界总储量的0.2%。叙利亚政府直接参与制定叙利亚石油的有关政策、规划、法规等。叙利亚政府规定：外国石油公司从勘探到钻井的全过程均要有叙技术人员参加；叙地质专家参与地质分析和评估；外国公司所获得的所有资料必须放在叙石油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拥有租让地的外国公司不得将其区块产出的原油擅自出售和炼制，而要以协议价格售给叙利亚石油公司，但与叙达成产品分成合同者在原油销售上可享有自由。这些政策给西方从叙利亚进口石油增添了不小的障碍。

因此，通过干涉叙利亚的“民主

化”，培植亲西方的政权，从而使其放松对叙利亚石油的管控，加大对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符合西方的石油利益。

另外，近年来什叶派的势力在中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什叶派掌控了伊朗和叙利亚。为了谋求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防止什叶派掌控中东，西方国家采取了干涉叙利亚民主化、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行动。

在此次叙利亚动荡之初，西方大国称将推动叙利亚民主政治改革，但当巴沙尔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取消紧急状态法，取消国家最高安全法庭，给予民众和平游行的权利，以及释放参加游行的人员之后，西方国家又开始强调以巴沙尔下台为其最终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民主化种子并不能在阿拉伯国家这片土地上结出一个美丽的果实。阿拉伯国家内部宗教派别冲突与大国利益交织的特点，使得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往往带有冲突性质。

而对西方国家来说，“民主”成为了它们从阿拉伯国家获得利益、推翻其政治对手的工具。■

“武士道与日本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召开

2012年7月10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和该所的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武士道与日本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日本关西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知识》杂志社、国家质检总局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王炜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斌瑛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张洪红博士、杨清淞博士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就上述发言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指出，神道、武士道、天皇制是日本文化的符号，了解这些对于深化日本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不同的时代武士道的内涵不尽相同，武士的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研究武士道需要跨时

代、跨空间的比较视角，亦可以将武士道与中国的侠客精神、欧洲的骑士精神等加以比较。

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也指出，武士道的研究还有许多课题值得去做，比如武士内部的分类，武士道在近代为什么能很快与西方文化相适应，武士道与日本文化的关系，等等。

北京联合大学纪廷许教授认为，研究新时期下武士道在日本社会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做了精彩的点评。

崔世广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研究日本文化需要关注其根源，客观、深入地把武士道等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民众，对于加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具有重要意义。